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分析

李春林,刘杰美

(燕山大学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为了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高校自主办学活力,中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政。文章以2015年至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153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数量、政策主题、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类别、政策效力等五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政策的典型特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有较强和稳定的政策供给且存在年度不均衡性,政策主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政策制定模式,意见、方案和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政策效力较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放管服”改革; 政策; 典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2)11-0045-06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2.11.010

中国的教育政策过程有其自身的环境、特点和行为逻辑^[1]。国务院于2015年5月12日召开了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提出了“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重点工作。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旨在为高校松绑减负、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从而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要求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自2015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第一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以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形成了这一领域的政策体系。

一、文献综述

关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研究,逐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了权力配置问题。曹晓婕和阎凤桥总结了央地两级政府下放给高校的自主权呈趋同取向,但存在省际差异^[2]。刘业进认为,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举措在于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3]。二是分析了改革实施情况。姚荣认为,政策尚未完全落地,改革仍然面临着政府“放不下”与高校“接不住”的两难困境^[4]。刘永林和周海涛认为,政策规定往往很诱人但落地效果却不尽如人意^[5]。林清泉和刘典文对福建省开展的相关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成效初步显现但存在一些

不足^[6]。三是分析了制约改革的因素。姚荣认为,改革受到政府高权管制思维和高校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7],改革推进受制于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8]。王立兵认为,推进改革面临的重大法律难题是改革的先行性与法律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9]。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一领域正在逐步引起学者们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既缺少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宏观和整体研究,也缺乏相应的定量研究成果。比如,自2015年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多份涉及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政策,这些政策由哪些政府部门发布,包含哪些政策主题,表现出怎样的特点,未来的政策优化方向是什么。以上问题关涉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宏观上的基本认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对2015年至2021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量化分析,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并据此提出未来的政策优化方向。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维度

1. 数据来源

2015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2015年推进简政放

收稿日期: 2022-03-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 特征、逻辑与优化策略”(编号: BIA210179); 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省级政府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现状、困境及优化路径”(编号: BJ2021071);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中国省级政府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路径研究”(编号: C20221553); 河北省社会发展科学研究课题“河北省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优化路径研究”(编号: 20220202465)。

作者简介: 李春林,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 刘杰美,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

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深入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2015年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2017年3月31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若干意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领域的专门文件。2015-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

本文将2015年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起点,以2015年至2021年共计七年时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本文获取政策文本通过以下途径:一是中国中央政府官方网站,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财政

部、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门户网站;二是文献数据库,如北大法宝、北大法意等。本文建立了相应的政策文本数据库,并对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反复研读,最终确定153份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

2. 分析维度

对政策典型特征进行系统分析,需要综合考察政策文本的结构性变量及其相互关系^[10]。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政策文本的相关研究,并在认真研读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政策数量、政策主题、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等五个变量。本文确定的变量及指标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指标

变量名称	指标及相关说明
政策数量	以份/年为单位。
政策主题	根据政策名称并通过阅读政策文本,提炼归纳政策主题共计12类,包括改革发展、创新创业、优化服务、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置、资产资金管理、教师队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评价制度、党建与思政工作、强化监管。
政策发布机构	政策发布机构分为两类:一是单独发文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等;二是联合发文机构,由以上2个以上机构联合发布政策。
政策类别	根据政策名称,将其归纳为5类,即意见、方案、规划、办法、通知。
政策效力	根据发布政策机构的级别,将政策效力从高到低分为3个等级,即A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B等(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发布)、C等(各部委下属机构发布)。

三、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典型特征的量化分析

1. 政策数量分析

政策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某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国中央政府在2015年至2021年总计发布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153份,年度发布政策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供给力度总体上比较稳定。年度平均发布政策21.9份,表明在这一领域,保持了较高强度和稳定的政策供给。第二,年度发布政策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一些年度,如2017年政策发布28份、2018年发布35份、2020年发布30份,这些年度发布政策数量比较密集。另一些年度,如2015年发布10份政策、2016年发布14份政策、2021年发布16份政策,年度发布数量相对较少。出现这种波动的原因是:2015年和2016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起步和探索阶段;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专门文件,为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指明了方向,之后政策发布呈上升趋势。在随后的几年,中国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不断拓展政策的供给范围,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来看,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可观,质量稳步提高,虽然政策供给数

量稳定,但存在年度不均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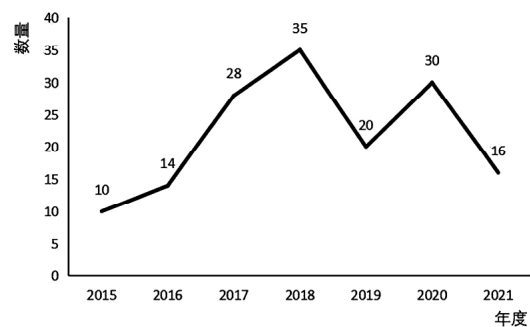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年度发布数量趋势图

2. 政策主题分析

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主题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关注点和侧重点。通过对政策名称中关键词的提取并进行归纳汇总,本文将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主题分为12类,政策主题的年度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对表3进行横、纵两个方向的分析:从横向上看,在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推进中,政策主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央政府于2015年发布了“改革发展”“创新创业”“优化服务”“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置”“资产资金管理”等6个政策主题的政策,2016年新增了“教师队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评价制度”主题,2017

年新增了“党建与思政工作”“强化监管”主题;从纵向上看,政策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改革发展、优化服务、科研管理、资产资金管理、评价制度等政策主题。在数量分布中,排名前5位的政策主题分别是改革发展27份、评价制度17份、科研管理16份、资产资金管理16份、人才培养16份;在年度分布中,“改革发展”“创新创业”“资金资产管理”等3个政策主题在7年中全部涉及,“优化服务”“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置”“科技成果转化”“评价制度”等5个政策主题在7年中有

6年涉及,这些政策主题可以视为当前政策供给的重点领域。总体来看,在所有政策主题中,改革发展类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着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方向。强化监管类政策数量最少,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在监督管理方面关注尚显不足。评价制度类政策数量较多,评价制度的健全有利于遏制浮躁的不良风气,规范政策的执行和推进改革的实施。通过以上分析,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变迁过程。

表2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主题年度分布表

年度	政策主题											
	改革发展	创新创业	优化服务	科研管理	学科专业设置	资产资金管理	教师队伍	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	评价制度	党建与思政工作	强化监管
2015	2	3	1	2	1	1						
2016	2	1	3	1		1	1	3	1	1		
2017	9	1	3	1	1	3	1	1	2	2	3	1
2018	5	1	1	5	1	4	5	1	7	3	2	
2019	2	1		5	1	1	2	1	1	3	2	1
2020	4	1	2	2	2	1	4	1	5	6	1	1
2021	3	1	3		1	5		1		2		
小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3. 政策发布机构分析

本研究对153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统计后发现,政策发布机构众多,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由2015年的5个机构增加到2021年的34个机构。参与政策发布的主要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等34个机构。

从政策发布机构分析,单独发文91份(占59.5%),联合发文62份(占40.5%)。这说明,在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单独发文和联合发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单独发文的机构中,中共中央单独发文2份,占2.2%;国务院单独发文16份,占17.6%;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文23份,占25.3%;教育部发文37份,占单独发文总数的40.6%。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及教育部单独发文数量占到总数的85.7%,说明这四个部门在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推进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他单独发文的机构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共计发布政策13份,占发文总数的14.3%。

在联合发文机构中,2机构发文38份,占联合发文总数的61.2%;3机构发文12份,占联合发文总数的19.4%。2机构和3机构发文共占联合发文总数的80.6%。4机构、5机构、6机构、7机构、8机构、9机构总计发文12份,占总数的19.4%。这说明联合发文以2机构和3机构为主。在联合发文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5份,占联合发布总数的8.1%,发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发布的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14份,占联合发布总数的22.6%,其发布的政策应用比较广泛且持续性较强。教育部与其他机构联合发文次数最多,共参与37份政策的制定,占联合发文总数的59.7%,且绝大多数为牵头发布机构,影响能力远高于其他部门。由此可见,联合发文的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仍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教育部为主导,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政策制定模式。

表3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发文部门出现频率总体情况

发文部门	出现频次	所占比例	发文部门	出现频次	所占比例
教育部	74	27.0%	中央政法委	2	0.7%
国务院办公厅	37	13.5%	国家知识产权局	2	0.7%
财政部	27	9.9%	教育部办公厅	2	0.7%
国务院	21	7.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	0.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6	5.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	0.4%
中共中央办公厅	14	5.1%	中国科协	1	0.4%
科技部	13	4.7%	农业农村部	1	0.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3	4.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0.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9	3.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1	0.4%
中共中央	7	2.6%	共青团中央	1	0.4%
中国科学院	6	2.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	0.4%

中共中央宣传部	4	1.5%	中国人民银行	1	0.4%
工业和信息化部	3	1.1%	商务部	1	0.4%
中共中央组织部	3	1.1%	文化和旅游部	1	0.4%
中央编办	2	0.7%	中央网信办	1	0.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	0.7%	财政部办公厅	1	0.4%
中国工程院	2	0.7%	总计	274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0.7%			

表3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发文部门出现频率总体情况。在153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中,各部门总计出现274次,平均每份政策文本出现部门1.79次。所有部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教育部(74次,占27.0%),其次是国务院办公厅(37次,13.5%)、财政部(27次,占9.9%)、国务院(21次,占7.7%),四者共计出现159次,占各部门出现总数的58.1%,反映了在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这四个部门的重要作用。教育部负责相关政策供给,国务院办公厅负责整体规划,财政部负责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国务院起到领导作用。在其他机构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参与政策发布16份,并牵头制定了《关于深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以推动分类评价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参与政策发布14份,涉及8个政策主题领域,在推进改革整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科技部参与政策发布13份,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参与政策发布13份,在主要改革政策制定、试点方案提出等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单独发文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中共中央单独发文的2份政策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国务院单独发文的16份政策采取的主要政策类型是意见、方案和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文的23份政策主要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和方案,教育部单独发文的30份政策主要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和办法。从联合发文情况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计联合发文5份,其中3份以意见的形式公布,其他以方案、规划形式公布;教育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发文共计37份,其中22份以意见、6份以办法、4份以方案形式公布,其他以规划、通知形式公布;财政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发文共计23份,其中10份以意见、5份以办法、5份以通知形式公布,其他以方案、规划形式发布。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常采用的政策类别是意见、方案、规划,发布的是相关政策主题的纲领性文件,其关注的政策主题更宏观,而教育部等部委则更多地通过意见、办法、规划、通知等进一步落实。

表4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与政策主题交互表

政策类别	政策主题												总计
	改革发展	创新创业	优化服务	科研管理	学科专业设置	资产管理	教师队伍	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	评价制度	党建与思政工作	强化监管	
意见	8	9	8	8	1	7	10	2	16	12	6	2	89
方案	10		2	3				1		2	1		19

4. 政策类别分析

本文将153份政策文本进行归类整理,图2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分布情况。由图2可见,意见是应用最多的政策类别,占到总数的58%。“意见”是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时所使用的文种,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除了“意见”类型以外,“方案”和“办法”类型的数量也较多,共有37份,占24%。“方案”是根据有关文件及精神制订的具体计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办法”是机关单位为实施法规或管理工作的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法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体来看,意见、方案、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以上政策类别使用占到总数的82%,规划、通知使用相对较少,文本类型较单一。在法律法规层面,目前缺少专门针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全国性法规,因此还需不断丰富政策文本类别,从而更深入地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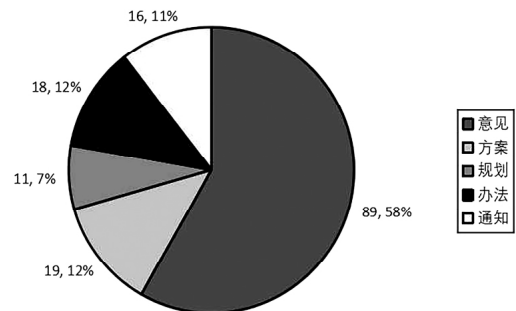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统计图

表4展示了政策类别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关系。可以对表4进行纵、横两个方向的分析。在纵向上,可以分析每一政策主题使用了哪些政策类别,如创新创业和人才培养主题只使用了意见政策类别,优化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主题使用了全部政策类别,改革发展与评价制度主题使用了4种政策类别等;在横向上,可以分析每一政策类别在不同政策主题的使用情况,如意见这一项政策类别应用到所有政策主题中,办法应用到8个政策主题中,方案与通知应用到6个政策主题,规划应用相对较少,只应用到4个政策主题中。

规划	8		1					1			1		11
办法	1		1		6	5	1	1		2		1	18
通知			1	5		4	2	3		1			16
总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153

5. 政策效力分析

政策发布部门的不同代表着政策效力的差异。表5展示了政策效力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关系。根据发布政策机构的级别,将政策效力从高到低分为3个等级:A类政策的发布机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具有最高等级;B类政策的发布机构主要是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其他部委,具有较高等级;C类政策的发布机构主要是国务院部委下属各机构。政策发布机构的等级影响着政策适用范围和效力,反映制定者的利益和态度。A类政策共计23份,占总数的15%,分布在9个政策主题中。改革发展、创新创业和科研管理政策主题共计13份,占56.5%,其他10份政策分布在优化服务、资产管理、教师队伍、评价制度、党建与思政工作、强化监管政策主题中。B类政策共计127份,占总数的

83%,分布在所有政策主题中,其中,改革发展、资产资金管理和评价制度主题分布政策较多。C类政策共计3份,占总数的2%,分布在2个政策主题中,均与科学研究相关。政策效力的高低是国家对于该领域重视程度的最直接体现。由此可见,在发布政策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的A类政策和B类政策中,较之与行政级别较低的C类政策,其政策的适用主题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表现出政策发布机构等级越高,政策效力越大的特点,不仅衡量了政策本身的重要程度,也体现出国家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重视程度。同时,从政策数量上看,A类政策与B类政策发布数量共计150份,占总体的98%,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效力较高,政策实施后能产生较强的实际效果。

表5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效力与政策主题交互表

政策效力		政策主题											总计	
		改革发展	创新创业	优化服务	科研管理	学科专业设置	资产资金管理	教师队伍	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	评价制度	党建与思政工作		强化监管
A类	中共中央				1			1						2
	国务院	5	4	2	3		1					1	16	
	联合发文			1			1	1		1	1		5	
	小计	5	4	3	4		2	2		1	1	1	23	
B类	教育部	4		5	2	1	2	8	1	5	4	5	37	
	国务院办公厅	7	4	4	2		2		1	1	2		23	
	其他		1			5	3		1				10	
	联合发文	11		1	7	1	7	3	3	10	10	2	57	
	小计	22	5	10	11	7	14	11	6	16	16	7	127	
C类	教育部办公厅								2				2	
	财政部办公厅				1								1	
	小计				1				2				3	
总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153	

四、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153份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数量、政策主题、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从政策数量上看,政策供给数量总体上比较稳定且强度较高,同时年度发布政策不均衡;从政策主题上看,政策演进方式总体上是从单一政策主题向多政策主题演进,政策主题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改革发展、优化服务、科研管理、资产管理、评价制度等政策主题;从政策

发布机构上看,政策参与机构不断增加,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以及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政策制定模式,形成推动改革的合力;从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上看,意见、方案、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规划、通知使用相对较少,文本类型较单一,政策效力总体较高。

2. 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和拓展。一是强化立法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中国中央政府需加强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通过立法提高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权威性。可以采取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理顺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权限、明确高校的法人地位和权益、构建高校内部治理法律体系等措施来完善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法律保障机制。二是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理念转变。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背后潜藏着一种政府高权管制逻辑,高校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权而非权利,导致国家难以推动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影响高校依法治理能力的增强。从深层次而言,这种高权管制是基于“正面清单管理”的思路,从已发布的政策来看,大多数政策属于基于“正面清单管理”思路而开展的“增量改革”和局部突破。应该推动“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三张清单的建立与完善,实现从政府管制逻辑向高等教育法治逻辑的转变。三是建立健全监督保障体系。国家应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配套监督体系,以增强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避免监管不到位、放管分离的现象发生。可通过完善信用机制、“双随机”抽查、第三方评估等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四是加强政策的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有志于发展高等教育的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应该密切跟踪其他国家的最新实践探索,总结其典型经验,为中国调整相应政策提供借鉴。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深入研究,强化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总结政策体系及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断优化相关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整体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进行定量研究和初步探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挖掘高等教育

“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系统中蕴含的知识和规律,为更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 [1]陈学飞.本土化·理论化·经验化——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7(3):2.
- [2]曹晓婕,阎凤桥.政令统一与因地制宜: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九省市政策文本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0):76-85.
- [3]刘业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3-67.
- [4]姚荣.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两难困境与破解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37-46.
- [5]刘永林,周海涛.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2017(5):5-8.
- [6]林清泉,刘典文.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福建省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评论,2016(12):3-8.
- [7]姚荣.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意图、效应及其深化——基于《高等教育法》首次执法检查报告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2):1-10.
- [8]姚荣.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缘何如此之难——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20(7):1-7.
- [9]王立兵.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中法律保障的缺位与应对[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4):26-33.
- [10]刘丽丽,李春林.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政策的总体特征及演进规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2):26-33.

On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olicy of Decentralization, Regulation and Service

LI Chun - lin , LIU Jie - mei

(Yanshan University , Qinhuangdao 066004 ,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mov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un schools independ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is paper takes 153 reform polici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ntralization , regulation and service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 and analyze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ies from the five variables of policy quantity , policy theme , policy issuing agency , policy category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and stable policy supply with annual imbalance , and the policy theme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 forming a policy making mode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nd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Opinions , plans and methods are the most widely applied policy categories with high policy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 regulation and service; policy; typical characteristic